

# 當代教父學研究在中國

Matteo Nicolini-Zani 著<sup>1</sup>

本文作者綜合在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地串刊的相關文章，為當今華文世界的教父學研究現況，做了一個鳥瞰式的簡介。這個研究對有興趣了解華文基督教界的有心人士，會是有價值的資訊。

## 緒論

最近，一位中國學者撰寫了一篇題為〈柏拉圖在中國能有多少讀者？〉<sup>2</sup>以及另一篇題為〈關於外國哲學對中國文化建設的研究及其未來〉<sup>3</sup>的文章，其中他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中國人要學習和研究外國哲學？」<sup>4</sup>同一位學者，即北京清華大學的王曉朝教授，是中國大陸大學中，為數不多的研究教父學的學者之一。我們也願意向他提出類似的問題：教會早期教父在今日中國，會有多少讀者呢？為什麼中國學者應該研究

---

<sup>1</sup> 本文作者：Matteo Nicolini-Zani，義大利 Bose 隱修團體的隱修士、漢學家。由張榮芳譯成中文，交本刊發表。

<sup>2</sup> 王曉朝，〈柏拉圖在中國能有多少讀者？〉《博覽群書》第8期（2003），77-78頁。

<sup>3</sup> Wang Xiaochao, "On the Study of Foreign Philosophy in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ts Future",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1 (2006) 2, pp. 317-323.

<sup>4</sup> Wang Xiaochao, *ibid.*, p. 318.

基督宗教的教父學呢？請允許我引用王曉朝文章中的幾句話：

「中國當代的文化建設應當向世界開放，以開放的心態吸收西方歷史中每一時期所獲得的、好的成就，加快中國傳統文化的革新，從而建立當代中國文化。...哲學未來的發展不會將西方哲學或中國哲學列於首位，而是會通過多重的發展，將它們結合，並在合一中保留其多樣性。因此，中國學者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不僅是將西方哲學思想介紹給中國社會，從而為中國本地哲學發展鋪路，而且是中國哲學研究向世界開放過程中的一部分。<sup>5</sup>」

本文藉著回顧主要是在過去廿五年中，在中國大陸、香港以及部分在台灣發表的、有關當代中國教父研究的刊物，嘗試去思考這個及其相關的問題。所以本文主要是關於當代中國，特別是所謂的文革（1966-1976年）之後在中國大學中恢復的、對於基督宗教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於使學者了解中國在這一領域所進行的研究，希望藉此幫忙這項研究未來的發展<sup>6</sup>。

未來進一步的研究，也應當要考慮到當前研究的前提，這樣的前提至少可以分為三大類：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作品中教父作品直接或間接的引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在基督教出版物中提到的教父思想；主要在廿世紀初期針對中國修道院學生、由傳教學校和機構出版的天主教教材中援引的教父學。

---

<sup>5</sup> Wang Xiaochao, *ibid.*, pp. 321-322.

<sup>6</sup> 這篇報告的完成得力於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員，特別是林子淳和楊熙楠，以及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吳國傑，在訊息與資料方面大方的分享。他們也介紹我結識了一些在教父學領域作研究的中國大陸學者。

## 一、教父學作為當今中國基督宗教學術研究的一個分支

因為教父學是基督宗教研究廣泛領域中的一個分支，在談今日中國教父學之前，首先應當簡短介紹基督宗教研究，以及一般性宗教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殊狀況。中國的政府，至少在原則上，仍然是共產主義的，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無神論的理念，以及毛澤東和鄧小平思想基礎上的。

中國學者研究基督宗教從明末清初已經開始。但這項研究在人文社會科學和現代宗教研究跨學科領域中，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是在廿世紀才逐漸建立起來的。廿世紀上半葉，在中國的基督宗教不同教派及其修道院，首先開始了基礎的神學研究和調查。

1950~60 年代，中國大陸的學術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亂，遭受了沉重的政治壓力，所以只有在 1970 年代末期，專門的宗教研究機構才得以建立，並著手開始其研究工作。粗略說來，中國的基督宗教研究工作由四種類型的機構在承擔：（1）專門從事基督宗教研究的科研機構，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屬的研究機構，及其省市一級的對應機構；（2）政府部門的基督宗教研究機關，主要是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宗教研究中心；（3）居於第三位的教育研究部門，主要是大學及其為研究基督宗教成立的宗教研究機構和中心；（4）中國基督宗教各教會的學校和研究中心。

1980 年代末期，中國學術圈對於基督宗教的興趣明顯提高，越來越多的學者進入宗教研究、特別是基督宗教研究的領域。1990 年代，開設宗教研究課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以及宗教性的研究中心，和獨立的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的數目上升至 30

以上。起初，學者對於宗教研究的興趣還受到政治的約束，但是因著改革的推動力量，從 1990 年代開始，學者獲得越來越大的自由；無論是在與國外學者的交流方面，還是在中國境內的寫作與出版活動方面，他們的研究都沒有受到很大的限制。

大致說來，過去的廿年中，基督宗教研究的不同領域逐步建立，這是系統性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sup>7</sup>。這一點在出版物的性質中也得到反映，因為絕大部分出版物是系統性或介紹性的作品，涉及基督宗教的基本層面，比如基督宗教歷史、神學、哲學、靈修、倫理、藝術的導論。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宗教研究室的一位中國教授作出這樣的總結：

「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年中國學者的作品絕大多數是具有導論性質的。這些作品傾向於概論，而非專著；傾向於同研究對象沒有關係，而非投入進去；傾向於描述，而非分析；傾向於介紹，而非創造。而且，這些年基督宗教研究的特點在於，缺乏對於基督宗教神學或基督宗教思想

---

<sup>7</sup> 有關中國大陸基督宗教研究的組織及現狀的中文報告可參考：何光滬，〈1978-1999 年間的中國宗教研究及其與政治和社會環境的關聯〉，見 [http://www.usc.cuhk.edu.hk/wk\\_wkdetails.asp?id=923](http://www.usc.cuhk.edu.hk/wk_wkdetails.asp?id=923)；蔡彥仁，〈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的發展現況〉，載《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第 6 期（2008），87-134 頁；卓新平，〈當代中國基督宗教研究〉，載《基督宗教研究》第 1 輯（1999），1-14 頁；林子淳，〈多元性漢語神學詮釋—對「漢語神學」的詮釋及漢語的「神學詮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 19（香港：道風書社，2006），27-43 頁；荆世傑，〈50 年來中國天主教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載《宗教》第 3 期（2007），111-120 頁。也請參考《基督宗教研究》第 1 輯（1999）中〈研究機構〉部分，15-88 頁，這裡回顧和簡單呈現中國大陸 14 家基督宗教研究機構。

核心成分及內在動力的重要研究。反而，多數情況下，是從哲學、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基督宗教。<sup>8</sup>

這一階段研究工作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致力於將基督宗教名著和美國與歐洲學者的基本著述翻譯成中文。

在此意義上，確實如同一位中國學者所強調的那樣，「與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基督宗教研究相比較，中國在廿世紀的基督宗教研究屬於宗教學的二級學科」<sup>9</sup>。事實上，因為廿世紀中國對於基督宗教的研究起步較晚，所以遇到了很多困難，並且與國外的基督宗教研究相比，從整體的實力與成就角度來看，都還存在著很大差距。然而毫無疑問地，中國基督宗教的學術研究正在迅速崛起；正在迅速從第一階段過渡到下一階段。

在理論思想進步和新一代學者出現的同時，中國的學術界似乎感受到，在過去廿年為這門學科建立起的堅實基礎上，有著向更深入、更豐富研究發展的迫切性與必要性。在此背景下，不少學者正在以其刻苦的鑽研，促使這項研究進入新的階段<sup>10</sup>。

## 二、從事教父研究的中心及學者

據我所知，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屬於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的神學院以外，沒有學術機構提供教父學和教父研究的專門課程。在香港兩所有宗教研究機構的大學，也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和香港浸會大學的宗教及哲學系，定期提供有關教會歷史以及歷史神學的課程，其中包含教

---

<sup>8</sup> Dong Jiang-yang, "The New Trends among Chinese Christian-Studies Academics", *Quest* 4 (2005) 2, p. 5.

<sup>9</sup> 卓新平, 〈當代中國基督宗教研究〉, 7頁。

<sup>10</sup> Dong Jiang-yang, *ibid.*, p.5.

父研究。在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系提供西方哲學選修課，包括教父哲學；歷史系和宗教學系有時也會有課程涵蓋教父學研究。

在中國大陸的大學中，關於基督宗教思想（西方哲學和神學）的課程，或者有時在關於早期基督宗教歷史的課程中，可以找到對於教父學概括性的導論或深入的介紹。這是因為「在中國大陸人文學界的學術研究中，教父學或教父哲學的內容被置於西方哲學史學科的範圍內，成為這個學科的部分研究對象」<sup>11</sup>。

這裏，我們至少可以提及以下有此學科的研究機構。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提供關於基督宗教，也包括古代基督宗教歷史、神學和哲學的綜合性課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哲學系，都提供有關基督宗教哲學和閱讀基督宗教一些典籍的課程。上海復旦大學的哲學系也是如此。在西安的陝西師範大學提供關於基督宗教早期歷史的課程。在這些機構中，有時學生也被鼓勵研究教父學以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sup>12</sup>。

在中國大陸學術機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前杭州大學），這裏的哲學系和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即從前的基督教研究中心，提供有關希臘哲學和早期基督宗教的課程。浙江大學在研究西方哲學，特別是希臘哲學方面，已經有較長的傳統，因著這個傳統，形成了對於後期希臘哲學和早

---

<sup>11</sup> 王曉朝，〈教父學研究的若干方法論問題〉，見陳村富主編，《宗教與文化—早期基督教與教父哲學研究》（北京：東方，2001），147頁。

<sup>12</sup> 這裏我只提最近由羅躍軍在北京大學完成之題為《尼撒的格列高利研究》的博士論文。

期基督宗教思想的強烈興趣<sup>13</sup>。

陳村富教授，1991年基督教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及其主管，是創立、發展和鞏固這個領域最積極的一位。是他訓練出了今天在此領域工作的年輕學者，比如王曉朝，曾在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擔任教授，現在是浙江大學的教授，另外還有章學富、石敏敏和張新樟。

在中國大陸，有為數不多的學者在研究早期基督宗教和教父，並已發表了一些他們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學者，可以從大學、甚至是從政府獲得研究資金。

此外，我們特別提出周偉馳和吳國傑的名字，前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和奧古斯丁作品的翻譯，後者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宗教思想的教授，主要從事亞他拿修（按照發音也翻譯成阿塔那修、亞達納削等）的研究<sup>14</sup>，同時也是近年來倡導翻譯教父文獻、且卓有成效的理論辯論中重要的一員<sup>15</sup>。

香港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sup>16</sup>因首先開始從事將早期基

<sup>13</sup> 參〈杭州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維真學刊》5卷3期（1997），60~64頁。

<sup>14</sup> 參：Ng, N. K. K. (吳國傑) *The Spirituality of Athanasius. A Key for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mportant Church Father* (Bern: P. Lang, 2001).

<sup>15</sup> 參考吳國傑回應王曉朝的兩篇文章：吳國傑，〈評奧利金《論首要原理》的漢語譯本〉《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8期（2003），297~307頁；吳國傑，〈一點澄清：對王曉朝教授回應的回應〉《道風：漢語神學學刊》22期（2005），251~265頁。

<sup>16</sup>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每年兩次出版的新聞通訊，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有關中國大學基督宗教研究發展狀況的信息。此新聞通訊及其資訊可參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網頁：<http://iscs.org.hk>。

督宗教文獻進行中文翻譯的工作，而具有獨特的地位。1994 年他們開始「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及其「古代系列」（從希臘化時期至十五世紀的基督教思想文獻），現在已有 20 多部書目。這一系列是繼續從前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的使命。從 1940~60 年代，這個書庫發起了將基督教名著翻譯成中文的工作，並已經完成了 32 卷；遺憾的是，「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在其計畫完成之前就過早地結束了<sup>17</sup>。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從事的另一項值得一提的工作是，幫忙中國大陸的年輕學者做研究，並出版其研究成果。每一年，都有來自上面提到的學術機構的年輕學者，可以獲得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獎學金，這樣，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從經濟和學術上幫忙這些年輕學者繼續他們的研究。因著這一「道風獎學金」，在過去的幾年中，一些年輕的中國學者可以研究類似奧古斯丁的神學、斐洛的思想，和古代諾斯替主義（靈智派）等主題。這裏列出一些過去曾經為研究教父學而獲得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提供「道風獎學金」學者的名字，可能會有一些幫助（參考附錄）。

---

<sup>17</sup> 有關中國基督教出版物的介紹參考：〈漢語神學的出版：過去與現在〉，見楊熙楠、雷保德編，《翻譯與吸納—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 14（香港：道風書社，2004），199~285 頁；何光滬，〈中國大陸知識界關於基督教的文字出版〉，《基督教文化評論》6 輯(1997)，302~314 頁。最近新出版一部關於基督宗教研究資料的全面索引：金以楓編，《1949 年以來基督宗教研究索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



### 三、中國背景下從事教父學研究及其出版物的現況

王曉朝最近很好地描述了中國大陸教父學研究的現況：

「相對於其他各個歷史時期的西方哲學來說，教父學或教父哲學在中國學術界是被研究最少的領域。……我們可以說，中國學術界至今尚無系統的教父學研究。……從1990年代初開始，中國學術界高度重視對基督教的研究，但由於研究古代和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和哲學難度大、需投入很多，至今尚未見到有專門研究教父哲學的專著問世，教父哲學的資料絕大部分還沒有被譯成中文，許多重要理論問題極待解決。<sup>18</sup>」

顯然，在中國基督宗教研究方面，我們所得出的一般結論，也同樣適用於教父學研究。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的古代基督宗教名著，雖然過去幾年中增長速度非常迅速，但整體說來，還是非常缺乏。大部分作品是關於早期基督宗教的、普通歷史性或意識形態性的簡介，關於個別教父思想具體深入的分析，仍非常稀少。那麼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內，主要的興趣是什麼呢<sup>19</sup>？

---

<sup>18</sup> 王曉朝，〈教父學研究的若干方法論問題〉，145~147頁。也參考王曉朝，〈中國教父學的發展前景〉《道風：漢語神學學刊》28期（2008），44頁：「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學術界高度重視對基督教的研究，教父學的研究也有一定的進展。我們看到，在這個領域，出版了一批譯著和研究性的專著，也有了一批數量雖然不大，但以教父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學者。我們也看到，由於研究教父學的難度大、所需投入很多，因此迄今為止，還有大量的教父學沒有譯成中文，許多研究極待深入，許多理論問題極待解決。這任務的完成，仍需一兩代人的努力。我相信，中國的教父學研究在未來，將有一個更好的發展。」

<sup>19</sup> 有關過去25年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關於教父學的研究出版，

大體說來，最吸引他們注意力的主題之一，是希臘哲學和早期基督宗教神學的關聯和對立。早期基督宗教在受希臘羅馬文化影響的社會中傳播時，基督宗教與政治、文化和哲學上占主導地位之思想間的衝突及其相互影響，是王曉朝和章學富學術方面的主要興趣。毫無疑問，這一興趣是在當前反省基督宗教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中本位化的過程中產生；也就是說，中國學者在基督宗教與希臘—拉丁文化的相遇中，看到當他們反省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相遇時應當考慮的典範<sup>20</sup>。

在眾多教父中，奧古斯丁無疑是在翻譯和研究工作中最受關注的對象。我認為，這是因為他被公認為西方基督宗教世界中最傑出的哲學家 and 神學家。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是唯一一部有三種不同譯本的早期基督宗教作品。奧古斯丁的思想也被嘗試改善中國思想的人們視為「豐富的思想養料」<sup>21</sup>。最近，卡帕多細亞的教父吸引了數位年輕學者的注意力，他們願意將好多世紀之前，幾位教父有關人類生活和命運所做過的、與今日生活仍然息息相關的一些深度反省，呈現給中國人<sup>22</sup>。

---

可參：Nicolini-Zani, M., "Patristic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Survey with Appended Bibliography", 《神學年刊》29 期 (2008), 63~146 頁。作者在文章附上一個很豐富的書目，共 33 組 398 項。

<sup>20</sup> 可參考以下用英文撰寫的比較研究：Wang Xiaochao, *Christianity & Imperial Culture. Chinese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Latin Patristic Equivalent*, Studies in Christian Mission 20 (Leiden: Brill, 1998)。

<sup>21</sup> 參考周偉馳，〈中譯本導言：奧古斯丁反佩拉糾派的著作與思想〉，見奧古斯丁著，周偉馳譯，《論原罪與恩典：駁佩拉糾派》（香港：道風書社，2005），XLIX~LVI 頁。

<sup>22</sup> 例如可參考張新樟在尼薩的格列高利著作《論靈魂與復活》（*On*

談到在中國這一領域研究所面臨的限度和阻礙，最主要的問題之一，是圖書館中相關研究資源的缺乏。基督宗教的原始資料、原文的不同版本，以及西方語言的翻譯很少，而這些原文的中文翻譯則更少。這樣的狀況，不只是在公共的圖書館，在神學院以及神學研究機構中也是一樣。

最近，當我參觀香港天主教神學院和路德教會神學院的圖書館時，我親眼看到有關基督宗教和教父學中文書籍的缺乏。而中國大陸的狀況更差。香港天主教神學院教父學和禮儀學教授陳繼容和高夏芳修女兩位，都在中國大陸的神學院中教書，在2006年6月與她們的談話中，兩位都證實了這一點。她們給我舉出這樣的例子：中國只有三個天主教研究機構擁有米涅(J. P. Migne)編的《希臘教父全集》(*Patrologia graeca*)和《拉丁教父全集》(*Patrologia latina*)，它們是香港天主教神學院、香港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和上海佘山的天主教神學院，而後者的收藏並不完整。

張賢勇教授談他在中國大陸一個基督教神學院教學的經驗時，也強調了這一點：

「1980年代末，我在金陵開始講授基督教思想史課程時，講早期教父這一段，除了陳澤民教授自編的講稿，以及幾本中英文神學思想史和教義史著作，參考比較多的，只有我從美國帶回去的Edgar Goodspeed著《早期基督教文獻》。金陵在圖書數量方面，無疑是中國大陸基督教神學

---

*Soul and Resurrection*)的導言中所嘗試回答的問題：「為什麼要研究尼薩的格列高利？為什麼我們對在四世紀寫作的尼薩的格列高利感興趣？」：見尼薩的格列高利著，張新樟譯，《論靈魂與復活》(上海：上海人民，2006)，22-25頁。

院校之冠，應付日常教學，或許綽綽有餘，但論到深入研究，至少就歷史神學而言，我得承認連『基本設施』都很欠缺。<sup>23</sup>」

高夏芳修女也有同樣的觀點，由於缺少一本中文教父學手冊、由於一些早期基督宗教文獻中文翻譯的不精確、由於現有基督宗教名著翻譯中所使用的不同術語，她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教學都受到影響<sup>24</sup>。此外，大部分基督宗教和天主教神學院中所使用的教會史教材，是由基督教學者編寫，他們對於現代和當代神學的潮流，比對於早期神學思想的興趣更大。

第二個主要問題是，中國大學和神學院的學生缺少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訓練。由於對希臘文和拉丁文知識的缺乏，目前大部分基督宗教名著的中文版，都是從已有的西方語言譯本翻譯而成。

第三，中國大陸學術機構所做的研究，沒有更廣泛的神學史和靈修背景作為基礎。因而，所發表的研究成果，通常只是表面的，不夠扎實。

最後，將基督宗教神學術語翻譯成一個像中文這樣，在語言學、哲學和人類學方面都截然不同的體系，是具有客觀困難的，因而減慢了中文教父著作翻譯的腳步，也是中文教父研究發展的阻礙<sup>25</sup>。

---

<sup>23</sup> 張賢勇，〈教父學述介二題〉《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8期（2001），295頁。

<sup>24</sup> 個人的資訊。為這條以及其它珍貴的訊息，在此特別感謝高夏芳修女大方的分享，高修女多年在香港聖神修院講授教父學導論。

<sup>25</sup> 參考楊熙楠、雷保德編，《翻譯與吸納——大公神學和漢語神學》。

#### 四、評論有關奧利金與亞歷山大傳統的研究

爲更進一步推動討論，現在我想大致介紹中國關於奧利金和亞歷山大傳統方面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

最近由 F. Crombie 早期英文譯本翻譯成中文的奧利金著作《論首要原理》( *Peri archon, De principiis* )，由於翻譯者缺乏西方古代語言知識，作爲一個以西方譯本爲基礎翻譯的實例<sup>26</sup>，吳國傑教授以評論家之姿，對此中文譯本以間接資料翻譯的方法提出質疑<sup>27</sup>，而校對者和此譯本前言的作者辯護了這種方法的合理性<sup>28</sup>。無論如何，儘管對一些特殊術語的翻譯有所質疑，他仍然認爲這是一部很好的譯本<sup>29</sup>。

至於亞歷山大教父的作品，已經有一些有價值的中文翻譯出版，但是未來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在克萊門的著作當中，以下幾部可以用中文閱讀：《對希臘人的勸勉》( *Protrepticus* )，1962 年首次翻譯出版，1995 年再次翻譯出版；《對新受洗禮者的勸勉》( *Ad neophytos de patientia* ) 1962 年首次翻譯出版，1995 年再次翻譯出版；《導師基督》( *Paedagogus* ) 和《雜記》( *Stromata* )，兩部都是 1962 年翻譯出

---

<sup>26</sup> Roberts, A. & Donaldson, J. (ed.), *Ante-Nicene Fathers*, vol.4, (Buffalo: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 1885), pp.237~384.

<sup>27</sup> 參：吳國傑，〈評奧利金《論首要原理》的漢語譯本〉，301~302 頁。

<sup>28</sup> 參：王曉朝，〈先理解，後批評——對吳國傑教授書評的回應〉《道風：漢語神學學刊》19 期 (2003)，249~259 頁，尤 253~254 頁。

<sup>29</sup> 參：吳國傑，〈評奧利金《論首要原理》的漢語譯本〉，306~307 頁。

版；講道詞《富人的獲救》（*Quis dives salvetur*），是 1995 年翻譯而成的。

在奧利金的作品中，《辟克理索》（*Contra Celsum*）在 1962 年首先被翻譯而成；一個奧利金的釋經作品選集，1962 年被翻譯而成；《論首要原理》（*De principiis*）在 2002 年才出版。

在亞他拿修的作品中，《聖安當傳記》（*Vita Antonii*）被兩次翻譯成中文（第一次在 1980 年代，然後是 1990 年），而《論道成人身》（*De incarnatione Verbi*）在 2006 年才被出版。

在介紹基督宗教歷史或基督宗教哲學時，一般也會簡單扼要地介紹亞歷山大學派和個別的亞歷山大學派的教父。大體可說，在這些出版物中，所強調的主要是這個學派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中期柏拉圖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這一點也符合我已經提到的，研究基督宗教的中國學者一般的興趣所在是：早期基督宗教與希臘哲學和諾斯底主義的文化對證<sup>30</sup>。

1962 年出版的「基督宗教名著叢書」中，關於亞歷山大學派教父的一卷，已經簡單介紹過這些教父的思想<sup>31</sup>，在最近發表的一些文章中也有更多的介紹；但到目前為止，只有奧利金（按照發音也翻譯成俄利根）的作品被作為專輯全部出版，而且也只是在 2004 年才出版<sup>32</sup>。

---

<sup>30</sup> 特別參看章雪富，《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邏各斯基督論》，當代中國哲學叢書（上海：上海人民，2001），也參看石敏敏完成之題為《普羅提諾的哲學和古代晚期基督教的人論》的博士論文（杭州：浙江大學，2006）。

<sup>31</sup> 《亞歷山大學派選集》，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香港：東南亞神學教育基金會、基督教輔僑，1962）。

<sup>32</sup> 章雪富，《聖經和希臘主義的雙重視野：奧利金其人及神學思

雖然「對於中國學術界來說，對奧利金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sup>33</sup>，但是它被視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因為它提供了基督宗教內文化同化的典型模式。中國研究基督宗教的學者願意了解，奧利金如何答覆有關基督宗教與地方文化關係的重要問題，以作為他們嘗試發展一個漢語基督宗教神學，即用中文表達出的基督宗教神學，及其靈感的泉源<sup>34</sup>。

如何才在運用民族文化資源與保持基督教信仰的特性之間，達成適度的平衡？如何對待民族文化資源中的理論思維？奧利金的工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古代的範例<sup>35</sup>。

## 結 論

總之，與其它很多國家相比，中國學術界和宗教界對於奧

想》，維真基督教文化叢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同樣在這一年，一部由西方學者在1971年完成的克雷芒的傳記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塞爾瓦托利拉著，範明生譯，《亞歷山大的克雷芒》，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北京：華夏，2004），原著：Lilla, S. R. C., *Clement of Alexandria: A Study in Christian Platonism and Gnos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sup>33</sup> 王曉朝，〈中譯本導言〉，見奧利金著，石敏敏譯，《論首要原理》（香港：道風書社，2002），XXVI頁。

<sup>34</sup> 為了解漢語神學的特點及其發展可參考：Yang Huilin & Yeung D. H. N. (ed.),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林子淳，《多元性漢語神學詮釋—對「漢語神學」的詮釋及漢語的「神學詮釋」》；曾慶豹，〈什麼是漢語神學？〉《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1期（2006），125-158頁。另外，可參考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網站〈漢語神學—有關文章〉部分中所收集的文章。

<sup>35</sup> 王曉朝，〈中譯本導言〉，XXIX頁。

利金及其他教父的研究仍然不足。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大學和教會所存在的特殊政治、社會和宗教環境，這些研究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

我誠摯地希望，目前撒下的種子，在未來能夠結出更多的果實，因為我同意一位香港修女最近與我分享的看法：教父神學，特別是亞歷山大、安提約基和卡帕多細亞學派的東方教父們的神哲學語言，不但具有意義，而且更符合中國人的思想，因為中國人的思想比較富有直觀性，更適合象徵意義，而非理性。事實上，亞歷山大、安提約基和卡帕多細亞所處的近東地區，與中國所處的遠東地區，從廣義上來說，具有同樣的「亞洲思想背景」。

教父們的著作環境雖然以地中海周圍地區為主，但是他們既然所處理的是真理的議題，教父學發展便不可能只限制於傳承地中海文化的西方，隨著基督福音傳到中國，教父學也必能在中國情景產生其影響和貢獻，教父學在今日中國可以提出甚麼值得探討的？教父學與中國學術之間，誠然存在著很大互動與發展的空間，筆者相信當基督信仰在中國土壤越能產生積極力量時，教父學作為探究基督信仰真理的一個重點環節，也必將占有一席之地，當追溯其研究動機時，我們須要正視教父學內容的真理前設，才能從中吸取精華而不至捨本逐末，並特別在跟中國文化主題的交流中，參與其發展<sup>36</sup>。

---

<sup>36</sup> 李錦綸，〈教父學在中國的出路〉《道風：漢語神學學刊》28期（2008），50~55頁。



## 附 錄

為研究教父學獲得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提供「道風獎金」的學者（1999-2009）。

學者名	大學	學系	題目	學年
張新樟	浙江大學	哲學系	諾斯替主義研究	1999-2000
章雪富	浙江大學	哲學系	基督教柏拉圖主義	1999-2000
胡龍彪	浙江大學	哲學系	波愛修斯思想研究	2000-2001
張新樟	浙江大學	哲學系	古代諾斯替宗教研究	2000-2001
文靜	清華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論研究	2001-2002
王永生	北京大學	宗 教 學 系	奧古斯丁的時間觀	2002-2003
李磊	清華大學	哲學系	斐洛思想研究	2002-2003 2003-2004
張之鋒	北京大學	宗 教 學 系	奧古斯丁和孔孟儒家的核心倫理價值比較	2003-2004
劉玉鵬	浙江大學	哲學系	論亞里士多德神學及其與基督教神學之間的關係	2003-2004
劉玉鵬	浙江大學	哲學系	論普羅提諾靈魂學說及其對基督教神學靈魂觀的影響	2004-2005
楊慧	人民大學	文學系	古希臘神話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傳承	2005-2006
張力	浙江大學	哲學系	德爾圖良玉斯多亞主義關係研究	2005-2006
郭琳	清華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論兩個城邦	2005-2006
肖有志	中山大學	哲學系	希臘人與基督徒－克萊門《勸勉希臘人》的信仰	2005-2006
王佳	南開大學	文學系	簡論波埃修的音樂美學思想	2005-2006
焦靜梅	中山大學	哲學系	希臘教父克萊門著作中的寓意解經法	2006-2007
王木蘭	中山大學	哲學系	奧利金的寓意解經法	2006-2007
陳凱	清華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政治倫理研究	2006-2007 2007-2008
陳越驊	清華大學	哲學系	新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哲學	2006-2007 2007-2008
李樹琴	清華大學	哲學系	中國內地教父學研究述評	2006-2007
孫帥	北京大學	哲學系	「古今之爭」中的奧古斯丁	2007-2008
陳平	四川大學	道 教 與 宗 教 研 究 所	淺析奧古斯丁的愛德	2007-2008
薛薇	四川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駁學園派》與古代懷疑主義	2007-2008 2008-2009
蔣麗	中山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論記憶與信仰	2007-2008

琚亮	浙江大學	哲學系	論奧古斯丁神學中的「惡」的觀念	2007~2008
侯健羽	北京大學	哲學系 及宗教 學系	奧利金的遭遇和他的肉體觀念與禁欲思想	2008~2009
郁飛	四川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的幸福觀－淺析奧古斯丁《論幸福生活》	2008~2009
張清江	中山大學	哲學系	心與靈性的區別－從《聖經》及奧古斯丁相關闡述看	2008~2009
丁珊珊	南開大學	哲學系	論斐洛對《創世紀》的寓意解釋	2008~2009
張紹艷	南開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歷史觀解析	2008~2009
陳凱	清華大學	哲學系	天與上帝－董仲舒與奧古斯丁的宗教及政治思想	2008~2009
陳越驊	清華大學	哲學系	以普羅提諾為代表的新柏拉圖主義及其對基督教哲學的影響	2008~2009
李樹琴	清華大學	哲學系	雅典與耶路撒冷－德爾圖良神哲學思想研究	2008~2009
劉蘇丹	武漢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自由意志神正論辨析	2008~2009
楊慶	武漢大學	哲學系	奧古斯丁原罪與救贖思想	2008~2009
徐琪	浙江大學	哲學系	論奧古斯丁的友誼觀	2008~2009